

深圳文史



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六辑



海天出版社

深圳文史

第6辑

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 编 郭祥焰

副主编 祁守成 相南翔

冷鸿文 陈林德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文史. 第6辑/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4.2
ISBN 7-80654-079-2

I. 深... II. 深... III. 文史资料-深圳市
IV. 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352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陈邢准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王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 (0755) 83460730

深圳市机关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 年 2 月第 1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0 千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3.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深圳文史》(第6辑)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李德成		
顾 问	吴井田	王正明	姚欣耀
主 任	王玉洁		
副 主 任	郭祥焰	汤丽霞	林雨纯
	卢素心	杨朝仁	冷鸿文
	祁守成	杨宏海	相南翔
	黄英来		
主 编	郭祥焰		
副 主 编	祁守成	冷鸿文	相南翔
	陈林德		
执行编辑	刘俊兵		

目 录

·改革前沿·

- 早期的深圳证券市场 郑良玉 (3)

·人物述林·

- 新安女杰郑毓秀 彭全民 (27)
抗日英雄赖章 黎秀清 (36)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二三事 彭伊娜 (43)

·往事回眸·

- 一场惊心动魄没有硝烟的战斗
——深圳抗击非典记 毛剑峰 (59)
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深圳的
战斗历程 周士弟口述 何锦洲整理 (92)
邹韬奋、茅盾在东江抗日游击区 郑 新 (105)
1942年1月张文彬致党中央的两份电报
..... 张文彬 (111)
红色生命线 杨步云 (116)
深圳梧桐山剿匪记 叶腾芳 (121)

· 2 · 深圳文史

·委员风采·

人生因与命运抗争而精彩

——香港委员翁锐桂创业历程

..... 陈晓薇 (129)

·史事经纬·

康熙迁海：三百四十年前的一场灾难

..... 程 建 (143)

明清时期赤湾抗击外来入侵史话

..... 彭庆元 周保民 (156)

从雍正御碑看深圳推广普通话 王 基 (160)

深圳古代文化教育初识 麦 穗 (165)

蔡屋围纪事 蔡惠尧 (174)

·岁月留痕·

抗日战争时期宝安老照片 周雄伟 (185)

后记 (190)

改革前沿

早期的深圳证券市场

郑良玉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对股份制、股票已经不再陌生。股票经济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企业发展的重要筹资渠道，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有效途径。上海、深圳已成为亚洲重要的证券交易市场，而证券交易二级市场则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只是短短的十几年，我们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多少年的路程。现在回忆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参与这场改革的人都知道，当时确实经历过风风雨雨和艰难的探索。

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

从1990年至1992年是深圳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也是股市从冷到热、从乱到治的三年。

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

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它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赌博、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

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1990年初我到深圳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市长，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它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作为市长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书记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政府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

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扼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的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市委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市长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于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于（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人大及其常委会，

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规程。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上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

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灏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上海证券交易所总行批准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

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上升到几亿、十几亿。1991年末国务院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模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正确对待不同的声音

证券市场在中国兴起的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融资渠道的问题，它作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伴生儿，实际上揭开了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幕。它是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和企业管理制度的重大挑战。这项改革的深刻性、彻底性，就导致一种必然：它的产生、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遇到阻力和非难。

记得在股市疯涨的情况下，大约在1990年第三季度，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批转了一封群众来信，在高层传

阅。这封信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统统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有的人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人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同时从廉政建设角度考虑，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过去买了的怎么办？有人主张要退出来，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党政干部买股票是为了支持改革，是组织上号召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用今天的政策来判断过去的行为。而且也无法具体操作，买的股票，有的转让了，有的部分转让，你怎么搞得清？这个通知送到我签发时，我把要退的规定划掉了。我敢于这样坚持，因为我到深圳工作时，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已发行结束，自己没有买股票，我有秉公说话的客观条件。

这封来信李灏和我阅后，就到此为止。当时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不要因为这封信对股票市场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我和李灏同志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不能关，还要探索，还要在探索中发展。但是在种种压力下，我们也惶恐不安，迫切需要中央的支持。

恰逢1990年11月26日举行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庆典（特区成立是1980年6月，因考虑到中央领导的时间，庆典活动推后了一些时间）。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深圳，兄弟省市的领导也来祝贺。庆典后，江泽民总书记召集各省市领导开工作座谈会。李灏同志要我代表深圳作汇报。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的工作我没有汇报，专门汇报了股票市场的有关情况。主要汇报了5个问题：第一，当前股票市场过度投机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发展，一边完善，逐步规范的有关情况。第二，要加强证券立法，把交易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起草了一个暂行办法，作为国家法律颁布恐怕还不成熟，建议作为政府规章试行。第三，成立证券交易所，把交易活动纳入到政府可监控的轨道。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望人民银行总行尽快批准。第四，要求增加上市公司，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市场供求矛盾，一方面又可以帮助国有企业筹集发展资金，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第五，搞好廉政建设，市委、市政府已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能买卖股票，同时要抓好证券队伍和证券监管部门的建设。我们总的意见是股票市场还要发展，不能退。我说，现在股市起来了，就像下象棋一样，小卒子过了河，只能进不能退。

江泽民总书记没有马上表态，因为接下来还有许多省市要汇报。当天晚上吃过饭后，传来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明确指示：“股票市场问题，应该让深圳继续试验。”